

周作人年谱

(1885 - 1967)

编著：张菊香 张铁荣



天津人民出版社

周作人年谱

(1885—1967)

张菊香 张铁荣 编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年·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年谱:1885~1967/张菊香、张铁荣编著,一天
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ISBN 7-201-03354-9

I. 周… II. ①张…②张… III. 周作人(1885~1967)
—年谱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204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邮购部电话:27314360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0.5 印张 2 插页

字数:678 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48.00 元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
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
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
可抵十年的尘梦。



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
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
闷。在这样的時候，常引起一
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
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
火钵，喝着清茶，同友人谈闲
话，那是颇愉快的事。

——《雨天的书·序》

序

记得是1998年2月中旬,我收到南开大学张菊香女士一封信,说她和张铁荣先生合编的《周作人年谱》(1985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在增订,不久之后可以完工,希望我为增订本写一篇序。这本年谱我看过,印象好,甚至有钦敬之感,原因是一,材料丰富,可见是费了大力;二,传主是毁多于誉的人物,写他就难免沾染一些毁,未计较。初版本有李何林先生序,说了编年谱的必要性和优点,再写,像是也增加不了什么新意,当然,我也不能不想到由毁而来的难,所以未再思就先感谢而后谢绝。以为这件事就算了结,没想到不久又接到张女士信,说距最初编时已经十几年,外,境和风不尽同,而且有关材料增加不少;内,想法也应该不尽同,所以还是无妨说说,总之是还希望我写。这之后,总不少于半年吧,他们曾亲自来,谈增订的情况,曾送来一部分增订稿,以便我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增订后的面貌。形势是不拿笔不行了,决定再一次知难而进。编者希望畅所欲言,畅,就容易触及多方面,为了思路略有个条理,想大致谈四个方面:一,泛说编年谱;二,传主的人和文;三,关于弟兄对比;四,增订后的年谱。以下依次谈。

为周作人编年谱，推想会引来非议，我问过张女士，她说是这样。我是认为人各有所见，至少是人各有所重，别人重视编年谱，自己没有兴致看可以不看，背后说三道四就可以不必。此意还可以由积极方面说。我有时想，为了减少“逝者如斯夫”，如果可以抛开经济的原则（费纸，读者少，不计），年谱也是多多益善。比如街头的赵老汉，巷尾的钱大妈，百年之后，有人为编了年谱，至少是与之有关的后辈，必愿意看看。乏成就可述吗？没有成就，不惊天动地，也是一种人生，在上帝眼里，价值应该是一样的。此外是经历不平凡，对社会有小影响或大影响的，影响可以好，可以坏，可以香，可以臭，好，香，不用说，坏而臭呢？为了引为旧语的前车之鉴，新语的反面教员，也就宜于编入年谱。周作人是个经历不平凡、对社会有影响而且评价比较难的人物，说他臭也罢，香也罢，某时期臭、某时期香也罢，某方面臭、某方面香也罢，臭而兼有些香也罢，至少是为了辨别香臭，与他的作品相比，详述经历的年谱也许是更需要的吧？

二

难于评价，是因为说他多有可取，有同情汉奸之嫌；说他一文不值，而上千万字的著译具在。我在家也守妄语之戒（为活命而随着看小红书、喊万岁例外），中学阶段读新出版的文学作品，最推重周氏弟兄的，以为受益最大（包括有什么情意能够勉强说明白），古人一饭之恩终身不忘，所以一直视他们二位为老师。大学时期出入红楼，其时鲁迅先生已不在北京，直到六十年代前期，与长寿的周作人断断续续有些来往。这就加深了谈他之难，

因为除适才提到的困难之外，如果因观风而说得偏轻偏重，心里还会感到不安。上策是不说，更不写。想不到会遇见另一方面的困难。是八十年代初写《负暄琐话》，其中多触及我亲历的红楼内外的旧人旧事，完稿，交老友吕冀平看，他发现没有胡适和周作人，知道是畏难，就说难也要写，我不得已，补了《胡博士》和《苦雨斋一二》。称为“一二”，是不想多说；但也不愿意违心，所以开头说他一反吕端之为为人，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又过些年，受改革开放之风的影响，像是口和笔也可以更加开放，我应人之约，先后写了《再谈苦雨斋》（收入《负暄续话》）和钟叔河编的《周作人文选》序。写这两篇，用了钟叔河的“人归人，文归文”的原则，就是说，承认既有优又有劣，或较具体说，人，某一时期下滑，学问文章还是值得重视的，至少是不应该视而不见的。

《再谈苦雨斋》一篇是补充《苦雨斋一二》那一篇的，就是彼时心里有而没写出来的，由交往的琐事到行藏的大节，到学问、文章的评价，都写了，所以长到超过万言书。已经说过的不想再说；但想了想，关于为人，像是还可以补充说一些。总的是他（也许可以扩大为一切人）身上具有神鬼二气，神显鬼隐。隐的，至少是有时，力量未必小。我在中学阶段，以及三十年代前期出入红楼时期，主要是读他的作品，所见都是神的一面，典雅，温厚，淡泊，清高，学识、文章都是最上乘的。这种印象，不只我们年轻一代如此，老一辈，如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直到蔡元培、陈独秀，等等，也是这样看。不幸是生不逢时，来了日本侵略者。古语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他未能如松柏，只是霜降，就枯萎了。这情况使很多人初则大惊，继则大愤，可见他的神的一面在别人的心里植根是如何深。看看、想想别人的心境，他的枯萎就更加可惜。我出于“吾爱吾师”，在风传有附敌意之时，曾写

信表示要珍惜清名。我人微言轻，奇怪的是许多旧知交，文化界的大名人，始则劝，继则声讨，他像是也听而不闻。时间不留情，几年之后就换来，先是南京老虎桥的监狱生活，后是蜷缩于八道湾旧居的后院，门外可设雀罗，外加虽无形却重如泰山的耻辱。他应该悔恨，推想也不能不悔恨，可是他不说，笔下也没有承认过。我推测，这是他的学业和文章的包袱太重，多少年曾凝聚为“知堂”或“智堂”的帽子，还缺少用自己的手摘掉的勇气。

应该承认，他的所知确是不少。语言，通中、日、英、希腊，还有世界语。读得多，写得多，专就勤说，罕见。可惜是还有失误的一面。最大的失误当然是附敌，做伪官。看年谱中所记，那时期，在敌伪官场上周旋；作肉麻相，说肉麻话，间或写肉麻文，想到一个曾写《谈龙集》、《谈虎集》，我推重其学识、文章之人竟至这样，心里很不好过。也有些疑惑，比如就在那个时期，他还勤于读，勤于写，写他往昔惯于写的，对于其时的多种肉麻，他是怎么想的呢？在这方面，他也未能修辞立其诚，至少由推重勇于改过的人看，这就使他的失误显得更加严重。另一个严重失误是1923年7月的与鲁迅先生失和。这件事的内情，知者（张凤举、徐祖正等）不言，言者（许多外界人）不知。传闻是他的夫人羽太信子背后说了什么不满鲁迅先生的话，究竟说了什么，他们夫妇不说，别人也不好问。假定是有关礼仪的，我一直认为，失误还是在周作人一面。妥善的处理办法应该是：背后之言偏于饮食，用刘伶，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偏于男女，用葛理斯，说情动于中乃人之常情，可不计较。可是他听了夫人的话，与提携关照他几十年的、有至高成就的胞兄翻了脸。这件事制造一个时代的黑影，蒙在许多知交以及很多文化界人士的心上。也应该蒙在他的心上，尤其是鲁迅三十年代逝世、五十年代他写《鲁迅的故家》等书的

时候,他应该明白表示,他一时冲动,对不起鲁迅,可是他仍是不说。还有一件性质相类的小事,是四十年代前期为点什么事与弟子沈启无翻了脸,用明信片的形式发“破门声明”,内情如何且不管,我总觉得近于范雎的“睚眦之怨必报”,与他曾有的典雅、温厚面貌不能调和,总之也应该算作失误。此外还有个不怎么明显的,难于定名,生活之道?生活习惯?不好说,更难于定性,好?不好?也不好说,只说现象,是维持个有书、有笔墨、有茶的“寒斋”,安坐于其中,读,写。说寒斋,也是文人的门面话,其实就是冬日,屋里仍是温暖安适的,据说,他不能耐寒,总是深秋略有寒意就生火。这是小节,但会有大影响,如三十年代晚期,很多人劝他南下,他不动,舍不得书斋的安适平静也许是一个不小的原因吧?若然,这留恋安适,怕苦,总当算作他生活习惯或性格上一个大缺点,甚至称为致命伤也不为过。

以上谈人,话说了不少,是因为有些情况,我们年岁大的熟悉,年轻一代未必知道。谈文就可以不这样繁琐。不是因为有定评,是因为一,我已经谈过,没有新意;二,他的著作,只是近年也印了不少,味甜味苦,最好由读者自己品尝。可是有人认为,既是错误的多事,也就不值得品尝,因为人已臭,文就不会有什么价值。这是不承认可以“人归人,文归文”。我不同意,至少是不采取这种一扫光式的处理办法。单说人归人,假定生年可以满百,周作人的生活和著作还有前半生(事实是多于五十岁),也一扫而光吗?实事求是,解放以后的十几年,著不少,译更多,甚至敌伪时期,在书斋内所写自以为可以编入文集的,也不当筌而统之评为毫无价值。我们应该承认人各有见,承认,可以坚持自己的所见,但同时要尊重旁人的所见。这旁人,就写五十自寿诗的时候说,包括蔡元培在内,可以扩大到全国绝大多数文化人,对于

周的学识和文章，都是既欣赏又钦佩的。我认为这样的评价不错，直到人跌了跤，专就学识和文章说，仍不错。学识，一半来于多读，一半来于多思，然后一以贯之。关于读书多而杂，就我的所见所闻说，在红楼的范围之内，他是第一位。关于由学而培养的见识，多方面，大到人生、社会，小到花木虫鱼，我们可以不同意，但要承认，他能言之成理，没有冬烘气。文章呢，就算作先入为主吧，我的感觉还是中学时期的，绍兴周氏弟兄，一位长枪大戟，或刚劲；一位细雨和风，或冲淡，至少就韵味说，没有人能赶上。现在呢，也许真就“后来居上”了，据说年轻人中，已经有看不起鲁迅的，周作人当然更不在话下。我是保守派，或如有的人所评，落后，还要加上目力不济，所读少，但胆量未缩，也就敢放肆一次，说，包括看不起那二位的诸君在内，笔下的造诣离绍兴周氏弟兄的境界还相当远。单说周作人，我的想法是，人，某一时期可以唾弃，至于学识和文章，是不宜于一揽子计划扔到垃圾堆上的。

三

近些年来，著文谈鲁迅的不少，谈周作人的也有一些，也许因为一母所生，又同在南京、同往东京、同住北京，在文学界都有高名吧，谈兄，就常常触及弟，反之也一样。同时触及两位，就难免比较、评价。附敌，任伪官，鲁迅没有，这方面黑白分明，用不着费话。比，大多是比二三十年代，兄在上海写“惯于长夜过春时”，弟在北京写“前世出家今在家”。结论是兄有救世的抱负，而且知后即继以行，可敬；弟则没落，安于在寒斋吃苦茶，可耻。如此评断，像是是非分明，其中不再有问题。我有时想到这方面，觉得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对世事积极，或说热，不积极，或说冷，是立身处世方面的分歧。弟兄在这方面确是有分歧。分歧，既来于性格

的不同,又来自于学识方面的所见不同。当然都自以为是。据我所知,对于兄的由热而信,弟的由冷而疑,或说,兄的由信而热,弟的由疑而冷,双方都不以对方为然,并有争论,只是未过于表面化。两种态度,不能都对,从世风,定了案,说兄是而弟非,我不想表示什么意见,因为内涵过于复杂,越深入想越感到拿不准。比如说,也可以设想,时间拉长,兄更高寿,入五十年代,不能写“自由谈”式的杂感,他还那样热吗?时间再拉长,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许多秘密档案公开,他还费力印《引玉集》吗?这情况表示,在冷热方面对比两弟兄,是热而非冷,受推举的兄是未必永远点头的。

四

弟兄对比会有困难,更足以显示周作人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为了有些人想了解他,为他编年谱就成为颇有意义。据年谱1985年第1版编者“后记”,编者是接受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的一种《周作人研究资料》,编成年谱的。编年谱是费力的事,尤其周作人这样的人,经历复杂而且长寿。费力则难。难之一是搜集材料,各处找,有时还要到大海里去捞针。难之二是选择,要取重舍轻。难之三是编排,要条理清楚,以求便于查考。1985年本我大致看了一遍,觉得以上几个难题都处理得很好,这证明编者有才有学之外,还有敬业精神。也就因为有敬业精神,他们不满足于过去的成绩,又费大力,增补了许多新材料,总数超过二十万字。这增订本原稿,我看了一部分,看时有个感觉,是不只能看到周作人的清晰影像,比如出入红楼时期,还能看到不少其时文化界高层人士的活动情况。此外还有个优点,也值得说说,是让材料说话,编者不在旁边添油加醋,这就使读者多有

自己思考的余地。优点很多,对比之下,我的序文就很差,字数不少,大多是自己一时的胡乱想法,闭门在屋里说说可以,放在书前,附骥尾以传,纵使编者原谅,我是不能不抱愧的。

张中行

1998年11月18日病中

编写说明

一、周作人是一个极其复杂、很有影响而又聚讼纷纭的人物。在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他都是一个忽视不得、回避不了的存在。虽然从20世纪40年代中叶到70年代的长时期里，由于种种原因，对他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状态，然而，进入80年代后，周作人研究不仅重新复苏，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1985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当时，由于对周作人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状态，资料匮乏，出版社又限定篇幅，特别是囿于编者的水平与见闻，加以出版、印刷、校对方面的粗疏，1985年版的《周作人年谱》存在不少疏漏、不妥以至错误之处。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周作人的研究成果，一些与周作人有过某些接触或交往的同志所提供的有关情况与大量史料，使我们得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对《周作人年谱》加以修改、增订，以给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更为丰富、翔实的编年的周作人的史料——《周作人年谱》（增订本）。

二、编写本年谱，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选用有关周作人生平、思想、著作、翻译以及其政治活动等方面的资料，以期能准确、客观、系统、全面地反映出谱主一生的生活道路、政治趋向、

思想演变和创作翻译历程。

三、为了说明周作人生活、工作、著译的历史背景，在每年周作人的本事前，略记有关的国内外政治、文化大事。

四、周作人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翻译、校订的古籍、校阅的译文，年谱中一律记载。所写挽联、按语、书信、日记有选择地加以记载。所用资料，均按年、月、日顺序编入，无日可考者系旬或月，无旬、月可考者系季，无季可考者系年。著译有写作日期者，按写作日期入谱；写作日期不可考的，按发表日期入谱。

五、对周作人著作，包括译文的序跋、附记、书信中，能说明其政治见解、思想状况、文艺主张、创作观念者，多作了概要的介绍。限于篇幅，对有些作品，则只列篇名备查。篇名中涉及他人作品，用单书名号（如《〈潮州七贤故事集〉序》），与周作人本人作品（如《风雨谈·后记》）相区别。

六、本年谱后附《周作人著译简目》及《周作人别名笔名录》。《周作人著译简目》只列周作人自己编定的著作、校对的古籍、翻译及与别人合译的作品。他人编选的“周作人作品选”之类以及为别人校阅的译文，均未列入。所有的译著，只列书名，不列细目。《周作人别名笔名录》，在每一笔名后注明据现在查明该笔名首次使用的时间、作品篇名、发表处等，以供研究者参考。

七、年谱所引用的文字资料，皆注明出处，见于周作人日记的，一般不加注释。谱文中涉及到的文学史中的一般社团、报刊、人物，均未加注释。外国人名一般采用周作人原作中的译法，有的说明今通译之名。

八、本书的编写：1885年至1948年的谱文，由张菊香撰写；1949年至1967年的谱文，由张铁荣撰写。

目 录

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 乙酉)	1 岁	(1)
1888 年(清光绪十四年 戊子)	4 岁	(2)
1889 年(清光绪十五年 己丑)	5 岁	(4)
1893 年(清光绪十九年 癸巳)	9 岁	(4)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 甲午)	10 岁	(9)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11 岁	(10)
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	12 岁	(12)
1897 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	13 岁	(13)
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14 岁	(15)
1899 年(清光绪二十五年 己亥)	15 岁	(18)
1900 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庚子)	16 岁	(23)
1901 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	17 岁	(27)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18 岁	(40)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 癸卯)	19 岁	(49)
1904 年(清光绪三十年 甲辰)	20 岁	(55)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21 岁	(58)
1906 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丙午)	22 岁	(64)
1907 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23 岁	(68)

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24 岁	(72)
1909 年(清宣统元年 己酉)	25 岁	(78)
1910 年(清宣统二年 庚戌)	26 岁	(84)
1911 年(清宣统三年 辛亥)	27 岁	(88)
1912 年(民国元年 壬子)	28 岁	(91)
1913 年(民国二年 癸丑)	29 岁	(96)
1914 年(民国三年 甲寅)	30 岁	(101)
1915 年(民国四年 乙卯)	31 岁	(108)
1916 年(民国五年 丙辰)	32 岁	(113)
1917 年(民国六年 丁巳)	33 岁	(118)
1918 年(民国七年 戊午)	34 岁	(128)
1919 年(民国八年 己未)	35 岁	(138)
1920 年(民国九年 庚申)	36 岁	(154)
1921 年(民国十年 辛酉)	37 岁	(171)
1922 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38 岁	(191)
1923 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	39 岁	(220)
1924 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	40 岁	(252)
1925 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41 岁	(275)
1926 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	42 岁	(304)
1927 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	43 岁	(337)
1928 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	44 岁	(368)
1929 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	45 岁	(382)
1930 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	46 岁	(393)
1931 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	47 岁	(405)
1932 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48 岁	(413)
1933 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	49 岁	(424)